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海国孤生

——明代首辅叶向高与海洋社会

崔来廷 /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
中国
与世界

丛书
杨国桢 主编



海国孤生

—— 明代首辅叶向高与海洋社会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杨国桢 主编

海洋
中国
与世界
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国孤生：明代首辅叶向高与海洋社会/崔来廷
著.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12
(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杨国桢主编)
ISBN 7-81075-714-8

I.海... II.崔... III.叶向高(1559-1627)-人物
研究 IV.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7888号

海洋
中国
与世界

海国孤生

——明代首辅叶向高与海洋社会

崔来廷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编：330046 电话：(0791) 8592235 850431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太元科技有限公司照排部照排

印刷：江西教育印刷厂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12.875印张 259千字

印数：1-2500册

定价：33.50元

ISBN 7-81075-714-8/K·023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20 世纪后期,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大幅提高,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潜伏的危机。随着陆地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未来文明的出路在于海洋,已成为国际共识。21 世纪的海洋开发与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焦点之一。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出海洋是实现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两翼,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走入海洋,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大趋势。中国能否抓住发展机遇,建成海洋强国,与海洋世界产生良性的互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能否经受西方海洋霸权的挑战,消解遏制与对抗,在海洋竞争中占有自己的生存之地,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

究，是 21 世纪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我对历史的学术兴趣从陆地转移到海洋，对海洋发展陆地化描述的历史文本产生了怀疑，开始酝酿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人文社会学的探索。由于自知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计划，需要聚集力量，长期冷静思考，不断探索，不能为浮躁之风所动，以时髦理论虚构历史，或急于求成，追求轰动效应，故设想结合博士生的培养来进行研究，指导他们各选择一个专题，用 3~4 年时间，一步一个脚印、一届又一届地做下去。我的设想和思路得到博士生们的响应和认同，师生几经切磋，于是有一批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虽有几个失败无成，但大多间有新见，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做了基础性的学术积累。

1996 年，江西高校出版社独具慧眼，支持我挑选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加以修改，编成丛书，申请列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并主动承担出版任务。在他们的热心支持和鼎力帮助下，《海洋与中国丛书》（8 册）在上个世纪末面世，并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鞭策和鼓舞，促使我下定决心与时俱进，拓展研究计划，争取 2010 年前在主要领域都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成果，夯实中国海洋史学的基础。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12 册），便是《海洋与中国丛书》的延续，又是厦门大学“211 工程”第二期建设项目的成果之一。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以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的互动为研究平台，进一步深化中

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破除忽视海洋发展的观念、心态和认识的盲点,用翔实的历史人文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论证海洋是沟通中外的大通道,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海洋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的国家利益,海洋国土是历代先人开拓经营的结果,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海洋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和传统的学科结构,实现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渗透和融合,推动海洋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分析中国海洋发展与海洋世界互动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

纳入本丛书的各书,是从博士学位论文和国家、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及国外合作项目成果中选取的。作者大多风华正茂,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善于吸收国内外学界的新成果、新经验,有的已有多年积累,又经多年潜心研究,虽然水平难求一致,但均有创新的亮点。本丛书的内容分别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海疆政策、海洋经济管理、海神信仰、海上走私与反走私、海洋灾害,东南海洋区域、海上山东、环黄渤海经济圈的生态环境、经济开发与社会文化变迁、环中国海沉船、南海纷争与海洋权益、西洋航路移民、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的研究,多属立足学术前沿,扣紧时代脉搏的问题。在指导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研究顺序上,实现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的转换,把海洋视为一种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不仅是单纯的区域概念或产业概念;站在

历史学的立场,整合海洋考古、宗教史、环境史、灾害史、科技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和成果,填补研究空白,为海洋史学整体框架添砖加瓦,体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特色和风格,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勇于面对时代需要,追求传统与变革连续性的新思路,发挥学术的社会功用,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了增强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和扩大读者群,作者在通过论文答辩或课题成果评审之后,又对标题和文字作了大量的加工,或作章节调整,重新改写。所有引文都经查核原书,反复校对,力求准确无误。

我们深知,上述内容在中国海洋历史文化领域还仅是沧海一粟,要完成最初的构想还任重而道远。一代有一代的学术,让非主流的海洋史学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是我的梦想。感谢厦门大学的研究经费资助和江西高校出版社的精诚合作支持,给我圆梦的机会。人文社会科学对研究对象的阐述和说明不会有终极的结论,只要学术界承认我们努力过,尽心了,就是最高的褒赏。至于是否能够二十年磨一剑,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还要看今后的努力和学术的检验。

由于海洋发展在国史上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造成资料信息的大量流失和断层,今人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断面或碎片。即便如此,从民间和海外发掘史源,还有很大的难度。由于资料分散,检索不易,不少还需实地调查才能获得,受到人力、时间和资金的制约,埋藏地下和海底的文物证据更有待考古的新

发现,加上文理、古今、中外之间,学科专业分工过细,往往有好的选题,却一时难竟全功。特别是外国档案文献的利用,缺乏通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阿拉伯等语言的学术专才,需要培养引进方能解决,有关从海洋世界看中国的许多课题只好延后处理。此乃时势使然,非“不战”之罪,敬请读者见谅。

历史事实是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海洋史学的成熟有助于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发达。这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希望以书为媒,广交关注海洋的学术与职业背景不同的有识之士,开展学术交流合作,共同为提高海洋意识,弘扬中国海洋文化,繁荣海洋事业而努力。作为新兴学科,有许多新的发展空间,需要许多新人的参与、继承、开拓和超越。相信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海洋史学将在中国大放光彩。

楊國植

2003 年元旦

致读者

2002年8月底,笔者从中原大地负笈南下,千里迢迢来到了鹭江之滨山水辉映、风光旖旎的厦门大学,有幸忝列杨国桢先生门下,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学习研究海洋文明史及海洋社会经济史。坦率地讲,在内陆腹地长大的我,在来厦门之前,从没有接触过大海,对于海洋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更不用说对有关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了解了。入学后,在业师杨国桢先生的细心指导下,我一边开始有选择地阅读史料,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梳理过滤点点滴滴的海洋人文信息;一边阅读有关的海洋人文书籍,进行学术积累,为以后的学位论文选题作些准备。当我阅读了由业师主编、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海洋与中国丛书”之后,大受启发,我认识到,历史学研究原来也可以这样另辟蹊径。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枯燥的史籍似乎逐渐变得生动起来,笔者也越来越感受到海洋史学的精彩。就这样,三年多来,在业师的耳提面命下,我这个门外汉渐渐地走出了黑暗之境,一步一步地迈进了海洋史学的殿堂之门。

入校后,笔者一边修学位课程,一边着手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该寻找一个什么样的切入点呢?这个问题困扰着笔者。2003年春天,一次偶然

的机会,在同于运全、杨强等学友的闲聊之中,不经意地提到了历史人物与海洋的关系,记得当时谈到了叶向高、董应举、何乔远、张经、胡宗宪等几位历史名人,这五人除胡宗宪外,其余四人都生长在福建沿海地区,都与海洋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随后,笔者开始着手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查阅有关这几个人的信息资料。张经、胡宗宪的海洋活动与嘉靖倭寇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嘉靖倭寇的研究,近百年来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因此,笔者对此二人不予考虑。在接触叶向高的资料时,笔者了解到,叶向高出生在嘉靖倭乱时期,出仕后长期在两京为官,是神宗、光宗、熹宗时期的三朝元老,曾经两次做过内阁首辅大臣,主持朝政达十余年之久,是晚明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叶向高与别的朝廷官员有很大的不同:他的视野一直关注着海洋,关注着东南“海国”¹的安危,他称自己“家在海上”²,自称为“海国孤生”³、“海上孤生”⁴、“海上书生”⁵,谦称为“海上贱儒”⁶,称福建为“海邦”⁷、“海国”,把家乡的父老乡亲称之为“海邦之人”⁸。由于生长在海洋社会,叶向高步入政坛之后,虽然不得已远离了海洋社会,但他通过与亲朋好友、地方官员的通信联络,保持着同海洋社会的密切联系。

有鉴于此,笔者把试图厘清叶向高与海洋社会关系的初步想法,向业师杨国桢先生进行了汇报,看看这个选题是否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然后再作取舍。杨先生在认真听取了笔者的汇报后,又详细询问了有关叶向高研究的进展状况以及史料准备情

况,特别是关于叶向高本人所撰写的《苍霞草全集》等第一手资料中所包含的海洋信息。杨先生在经过了一番认真思考后,认为这一选题与他所建构的有关海洋史学的大方向是基本吻合的,属于其中的一个子项目,于是同意笔者把对叶向高与海洋社会关系的探讨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传统陆域视野影响的局限,我国史学研究一直存在着一种重陆地轻海洋的学术倾向,这就造成了中国史的一个奇特现象,也就是杨国桢先生所说的“海洋迷失”⁹。史学界对叶向高的研究也是如此。

有关叶向高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十多年来,有关叶向高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笔者所搜集到的与叶向高直接相关的论文仅有寥寥数篇,而且主要局限在政治史与宗教史层面。

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有关叶向高研究的文章仅有7篇,其中5篇是关于政治史研究方面的。有关叶向高的研究文章,最早的是范兆琪于1988年发表的《明代正直的名相——叶向高》一文,该文的篇幅仅有一千余字,仅就叶向高的生平进行了简单说明。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何孝荣发表《叶向高与明末政局》一文,就叶向高与晚明的两个皇帝(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大臣和宦官之间的关系,叶

向高的政治思想以及叶向高的主要政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肯定了叶向高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家。

饶龙隼的文章《叶向高与东林党议》,对叶向高与东林党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认真考察,他的主要观点是:一般认为,叶向高是明末东林党议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东林党的一员。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叶向高并不是东林党人,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而是当时党争的调解人。

冷东在《叶向高与东林党》一文中认为,明朝万历年间,叶向高在国本之争上确实与东林党人保持了一致,但是,这在当时也是大多数官员的意见,不能以此就确定叶向高是东林党人。事实上,叶向高入阁前与东林党人的观点尚多一致,但在进入中枢后,叶向高与东林党人的分歧日趋明显。尤其是天启年间,就有关宦官专权以及辽东军事问题,叶向高尽力斡旋于包括东林党人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成为中庸调和派。叶向高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同情东林党人,但就实质问题而言,叶向高并不是东林党人,更不是“东林党魁”¹⁰。

樊树志在《东林非党论》一文中涉及了叶向高,认为阉党把叶向高列为“东林党”的第二号人物和“东林党”的领袖,这完全是牵强附会。作者从叶向高执政后延续了沈一贯路线,与李三才、顾宪成的关系等方面加以论述,说明叶向高并非是东林党人,认为把叶向高当成是东林党的领袖,显然是曲解了历史,曲解了叶向高这个历史人物。

冷东的另一篇文章《叶向高与宦官关系略论》，就叶向高与万历、天启两朝的宦官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叶向高在处理与宦官的关系时，体现了他特有的稳健作风，特别是在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中，叶向高的认识是正确而清楚的，采取的避免决裂的方法也是可行的，遗憾的是不为东林党人所接纳，致使事情不可收拾。

此外，林桦的《叶向高〈苍霞草全集〉散论》一文，对叶向高著作整理情况进行了说明。

有关叶向高的研究著作，目前只有冷东的《叶向高与明末政坛》一书，全书约18万字。该书对叶向高一生的政治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叶向高所处时代时局之复杂，任务之艰难，超过了有明一代的任何一位首辅大臣。面临这样的局势，叶向高呕心沥血、苦心经营，努力调解各派政治力量的纷争，实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此书的出版问世，填补了叶向高研究没有专门著作的空白。

我国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在明代部分也涉及了叶向高：“东林党副都御史杨涟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忠贤恐惧，（顾）秉谦、（魏）广微等教忠贤尽杀诸正人，造《缙绅便览》一册，正人如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等一百余人称为奸党，邪党霍维华、阮大铖等六十余人称为正人，请魏忠贤按名赏罚。”¹¹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对叶向高也有类似的记载。此外，蔡美彪等人主编的《中国通史》也在个别地方提到了叶向高。

另外,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徐斌博士的论文《明清士大夫与琉球——以中、日、琉三国关系为中心》也曾提到了叶向高,其他研究晚明史及党争的国内外学者在著作中偶尔也会涉及叶向高与东林党、阉党的关系。

有关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播状况的研究文章,也有一些涉及叶向高,如林金水教授的《艾儒略与明末福州社会》、方宝川的《叶向高、艾儒略与西学初入福建》,以及马琳的《〈三山论学记〉中关于“天主”观念的文化对话》等。

林金水教授在论文中提到了“三山论学”,认为“三山论学”表面上是叶向高、艾儒略等人在讨论生死大事问题,但在叶向高的微言大义之中,流露出来的是借外来信仰以抨击时弊。方宝川在文章中则对叶向高与艾儒略的交往过程以及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播作了介绍。

马琳的文章以《三山论学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叶向高、曹学佺与艾儒略之间关于基督教中的核心概念——“天主”的探讨过程。艾儒略针对叶向高、曹学佺的提问,较全面地阐述了天主的含义,包括天主的形而上以及伦理的两个层面。在对话中,双方虽因文化传统的差异而造成一定的误解,但通过交流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

台湾学者潘凤娟的《西来孔子——明末耶稣会士艾儒略在华事迹考》一文,对艾儒略在华传教尤其是在福建的传教活动及著述进行了研究,文中也提到了叶向高以及“三山论学”。

香港学者陆鸿基博士 (Bernard, Luk Huang - Kay) 发表论文 “And Thus the Twain did Meet? The Two World of Giulio Aleni”。遗憾的是, 笔者没能找到原文, 据潘凤娟女士介绍, 该文主要介绍艾儒略的《三山论学记》、《性学粗述》以及《职方外纪》三书的内容, 翻译之后稍作分析。

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林金水教授的《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一书, 该书第四章介绍了有关叶向高与利玛窦、艾儒略的交往状况, 该章第三节“中西文化在福建的冲撞”第一部分还对艾儒略与叶向高的“三山论学”进行了认真研究。另外, 方豪教授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法国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等书籍也提到了叶向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有关明代海外贸易、海防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很快, 出现了不少力作, 仅笔者收集到的论文就有上百篇之多, 此外也有一些颇引人注意的专著。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 都没有涉及叶向高与海洋社会的关系。

杨国桢先生的《16 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一文值得我们注意, 该文对 16 世纪中国的海洋政策进行了探讨。杨国桢先生认为, 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辟, 海洋经济的互动打破了洲际隔绝的局面, 也突破了传统的局部贸易模式, 使之带有了全球性的意义。以漳州海商为先鋒的海洋力量异军突起, 葡萄牙海洋势力来到了亚洲海域, 日本倭寇南下东海, 使中国海洋区域成为东西方海洋竞争的

大舞台。蔓延十几年的嘉靖倭乱,给东南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也促成了东亚贸易网络各种海上力量的大调整。隆庆元年(1567年),漳州月港的开放,是官府与民间海上力量激烈较量后妥协的结果。16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东亚海域,中国面临西班牙、日本的双重威胁与挑战,之后,荷兰海洋势力也来到东南亚海域,成为漳州海商新的贸易伙伴与竞争对手。不过,到16世纪末,还没有形成现实的危机,在当时,主导东亚贸易网络的仍然是漳州海商。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有关叶向高政治方面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其与海洋社会的关系,有关海洋社会方面的研究也基本没有涉及叶向高,甚至就连有关叶向高的著述也很少被研究者所引用,有关叶向高与宗教方面的研究也很少涉及其与政治及海洋社会的关系。因此,有关叶向高与明代中后期海洋社会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对于明代中后期海洋政策演变的研究也存在着诸多盲点与薄弱环节,一些领域的研究亟待加强与提高,而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力图弥补这些不足之处或填补叶向高与海洋社会研究的空白。

二

本书探讨研究的范围是明代中后期叶向高与海洋社会的关系,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历史学本位为出发点,采用“科际整合”的方法,恢复明代中后期海洋社会的历

史概貌。因此,本书的主旨是以叶向高为研究切入点,透过叶向高来研究明代中后期的海洋社会,着重探讨叶向高与海洋社会的关系,再现叶向高生活时代的海洋社会的历史场景。通过本书的研究,笔者力图填补叶向高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也为有关叶向高以及海洋社会的研究提供某些帮助。为达成这个学术研究目标,本书把叶向高的一生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以每个历史阶段与海洋社会的关系为主线,同时兼顾叶向高的政治活动和海洋社会发生的重大事变,并以此作为本书的基本分析架构。笔者将全书分为七章,分别加以阐述。

第一章:透过叶向高的家世渊源,剖析倭难中的童年对叶向高后来海洋观形成的影响,探讨早年的叶向高与海洋社会的关系。

第二章:探讨叶向高在南京任职期间,在谏止矿使税监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分析叶向高与利玛窦的交往,以及与沈有容台湾剿倭的关系。

第三章:主要论述叶向高第一次主政期间与高案及大闽江口区域商人的关系,分析探讨叶向高在罢免高案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以及对大闽江口区域海内外贸易的影响。

第四章:探讨叶向高在退休期间,仍然不忘“海国”的安危,推荐老友沈有容击退倭寇对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关心民瘼,致力于海洋社会的公益建设,打击骚扰海洋社会的不法行为。

第五章:分析研究叶向高第二次主政期间,驱逐霸占澎湖的荷兰入侵者,以及与龙王和天妃信仰之